臺灣人類學刊 6 (1) ：77-102，2008

媽祖的故事與社區之歷史：以明清時期粵東一個港口的研究為中心

陳春聲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本文以明清之際廣東省東部著名的近海帆船貿易港口樟林鄉四座媽祖廟及其相關傳說的變化為例，討論華南地區民間信仰與地域歷史變遷之密切聯繫，說明華南地區普遍存在的天后信仰，在不同時期特定的社區歷史場景中，其功能與意義的變換。文章表明，據說在社區發展不同階段建立的四個媽祖宮，其相關的傳說正好反映了不同階段地域社會歷史的特點。這樣的研究或許可以說明，在一個有較長時期的文獻性歷史記錄的社會裏，對靈驗傳說的解讀，也有助於對社區發展歷史的理解。文章還力圖說明，歷史這隻「無形之手」實際上可能對林林總總的各種各樣傳說進行了某種「選擇」，使傳說與文獻記載的歷史過程相契合的內容，在漫長的流播過程中，得以保留下來。在其背後起作用的，實際上是人們對社區歷史的「集體記憶」。從樟林的故事還可以看出，這種「集體記憶」，在不同的人群之中有很大的不同，所反映的實際上是不同人群對社區歷史的不同感受和理解。所以，對廟宇傳說的解讀，實際上也是對不同人群有關社區歷史的「集體意識」的瞭解。

關鍵字：媽祖，潮州，海上貿易，民間信仰，鄉村社會

樟林是明清時代廣東省東部最重要的近海帆船貿易港口，1860年代以後此地又發展為著名的僑鄉，一直為許多研究海外交通史、東南亞史和華僑華人史的學者所關注（陳達 1938，1981：3-7；田汝康 1957：18--19；張映秋 1990：26-41；林遠輝、張應龍 1992，1993；素攀．占塔匿等 1991；黃光武 1996：112-141）。自1991年始，筆者也一直在這個鄉村進行具有歷史人類學色彩的田野調查（陳春聲、陳文惠 1994：90-105，陳春聲 1993：79-111，1997：369-395，2001b：100-108，2003：1-33）。根據文獻記載和田野調查所得，作者發現，該港口存在的四座媽祖廟及其相關傳說的演變，與地域歷史和社區性質的變化有著密切的聯繫。本文試圖通過對這種關係的解釋，說明華南地區普遍存在的天后信仰，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中，其功能與意義的變換。

在華南地域社會中，圍繞著村廟的活動，往往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文化資源和權力結構的歷史變遷與存在實態。廟宇在地域社會和信眾心目中的「力量」，除了在各種儀式性行為中得以表達和強化之外，也常常依賴於帶有強烈象徵意味的一系列「靈驗傳說」的存在。傳說的流播實際上是一個成千上萬次被「重複」的過程，「重複」不但使社區關於自己歷史解釋的「集體記憶」被保留下來，而且，通過本文的描述，我們還將發現，這種對「集體記憶」的「保留」，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實際上也不斷經歷著被「選擇」的過程。

就樟林四個媽祖宮的情形而言，當地的讀書人無疑是知道官方認可的有關天后的來歷及其正統性解釋的，這一點也反映在他們自己的著述中（李紹雄 1990：17-18；黃光舜[1]1996：3-4）。但是，有關廟宇來歷和神明「靈驗」新的故

1　本文較多地引用黃光舜先生的《閒談雜記》一書。黃先生為樟林中學退休教師，長期致力於鄉邦文獻的蒐集與整理，《閒談雜記》即為其所蒐集各種地方文獻和傳說的合集，1991年油印出版，1996年再出版鉛印的簡縮本。作者書前有如下題記：「本擬輯樟林舊事，因毫端常逸出桑梓範圍，且什亂無章，遂以『雜記』名之。又顧所搜集皆過去時代之事，非得有閒歲月閒心思不可操閒筆綴閒文，故又以『閒談』冠之首。大凡新事如子，舊事如胞；新事之出，如子破胞；知其生也有自來，而後知其變之不可違。因志焉。」關於天后的來歷，該書「新圍天后宮」條下有如下記載：「天后姓林名默，福建莆田湄洲嶼人。宋都巡檢林願第六女。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因彌月不啼，故名之曰默。歿于太宗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室處二十八歲。相傳林默生前歿後，屢顯靈應海上，民眾祀為海神，號曰『通玄靈女』。宣和五年，徽宗賜廟額曰『順濟』。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三十年加封號『昭應』。孝宗朝又先後加封號『崇福』、『善利』。光宗紹熙三年封『靈惠妃』。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八月封『天妃』。明太祖洪武五年封『聖妃』。成祖永樂七年封『天妃』。莊烈帝崇禎間封『聖母碧霞元君』。清聖祖康熙十九年封『天妃』。二十二年晉為『天后』。」

事，仍然不斷地被創造出來。更有意思的是，我們還注意到，這些故事之所以能被接受並得以流傳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恰好包涵了與各個廟宇形成時期特定的歷史環境相契合的文化內涵。通過對不同廟宇在不同時代形成的傳說的分析，可以加深我們對村落歷史和地區文化發展的瞭解。

一、樟林的歷史與四個媽祖宮的分布

樟林位於廣東東部韓江三角洲平原的北部。韓江三角洲平原是由於韓江帶來的泥沙淤積，於6,000年前開始形成的，至今平原仍在發育。平原形成過程中韓江不斷分汊，最後分19口從澄海縣入海[2]。韓江最北面的支流為北溪，由北溪經宋代人工開鑿的運河山尾溪，進入韓江幹流，直達潮州府城的水路，是傳統時期韓江中上游地區最便捷的入海船運通道。北溪入海口與三角洲北緣的蓮花山之間有條寬2–3公里的狹長沖積帶，成為三角洲往東北方向進入福建省的必經之路，明清兩代廣東通往福建的驛路在此通過，民國時汕（頭）樟（林）公路和（潮）安黃（崗）公路亦在此地交匯。樟林就位於這個交匯點上，北依蓮花山，南扼北溪口。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年）饒平縣設縣以前，此地歸潮州府海陽縣管轄，成化十四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隸屬饒平縣，嘉靖四十四年澄海設縣以後，樟林逐漸成為該縣北部最重要的政治、軍事和市場中心。

樟林作為一個聚落，是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為了抵禦倭寇、海盜而形成的。在此之前，樟林「先民」是一些散居在現在的樟林鄉北面的蓮花山麓的漁民或蛋戶，現存於蓮花山麓石壁頭地方的靈感宮舊址，清代以來，一直被當地文人視為開村以前先民已在當地居住的歷史證據。

嘉靖三十五年樟林聚落的形成，是當時潮州鄉村社會軍事化、聚落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的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其直接原因是沿海地區盜亂不止，地方動盪（陳春聲2001a）。樟林開村以後，還經歷過多次被海盜破寨擄掠的事件。反映這一過程的，是有關「暗芒宮」媽祖的靈驗傳說。據說，「暗芒宮」原位於村外

2　由於本世紀60年代以後圍海造田和並圍堵口的工程，現在韓江只有5個入海口。

的沙埔（紅肉埔）之上，後來因為兵禍移建村南的官道（樟東路）旁。清末香火逐漸衰落，現已不存。

樟林及其周圍地區，遲至清代康熙年間才出現相對安定的局面。此前，由於王朝更迭之際南明政權（包括鄭成功的武裝力量）與清朝軍隊長達數十年的拉鋸戰，以及地方上的盜匪活動，樟林一直處於動盪的社會環境中。康熙三年（1664年）潮州沿海實施「遷海」，樟林因地處「界外」，全鄉被拆毀。康熙八年（1669年）「復界」，樟林鄉得以重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海禁」之後，樟林逐漸成為當時東南沿海最重要的貿易口岸之一，乾隆、嘉慶年間樟林港貿易達到其全盛時期，從樟林港出發的「紅頭船」北上上海、天津，南下廣州、瓊州，以至東南亞各國，而在韓江幹流和三角洲縱橫交錯的水網中行駛的各種內河船隻更使樟林成為一個繁盛的轉口貿易據點（田汝康1957年；張映秋1990；林遠輝、張應龍1992，1993；林遠輝2002；素攀．占塔匿等1991；陳春聲2001b）。貿易的發展，促使商人、船主以及其他與商業活動有關的各色人等雲集樟林，港口兩岸出現了新興街等新的商業街區，乾隆末年在港口的近海處興建了當時廣東全省規模最大的媽祖廟——新圍天后宮。

隨著帆船貿易的發展，樟林社區內部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乾隆中葉以後，社區中心出現了長髮、古新、廣盛、仙橋、洽興、順興、永興和仙園等八個商業街區，加上其周圍的東社、西社、南社、北社、塘西社和仙隴社，形成了所謂「六社八街」的格局（陳春聲、陳文惠1994；陳春聲1993，1997，1999，2003）。在東、西、南、北四社中央，有一個用石牆環繞的城寨，康熙至雍正年間，這裏逐漸成為樟林及鄰近地區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城內建有樟林巡檢司、守備署、汛署、驛塘（急遞鋪）等行政和軍事機構，這些機構又建立了文祠、武帝廟和城隍廟等有官方色彩的廟宇。就在城隍廟的南面，當地居民興建了至今仍在社區內部有較大影響的「城內天后宮」。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距樟林僅30餘公里的汕頭成為新增的通商口岸。至1866年，當年汕頭港入口外國船舶已有525艘，總運輸量為211,800餘噸，洋貨輸入額達3,889,000餘關平兩（汕頭市史志委員會1960：3），帆船貿易時代的樟林實在難以望其項背。從此之後，除了維持與鄰近的東里、南澳、汕頭等地的短途客貨運輸外，樟林港在傳統時代作為「河海交匯之墟，閩商浙客，巨艦高桅，揚帆掛席，出入往來」（尹佩紳1827a）的景象也一去不復返了。在此

期間，樟林最明顯的變化是，本地人大量出洋謀生，僑居海外，整個社區的生計和地方建設越來越依賴於僑匯，終於由傳統貿易港口演變為一個典型的僑鄉（陳春聲 1997）。在這一變化中，新圍天后宮逐漸衰落，而城內天后宮則由於地處社區中心，其傳說包涵了與華僑出洋有關的內容，仍然香火興旺。

對本研究而言，我們感興趣的是，在長達數百年的社區發展過程中，有關這些媽祖宮的靈驗傳說和後人對媽祖宮歷史的解釋，是如何創造、變異和流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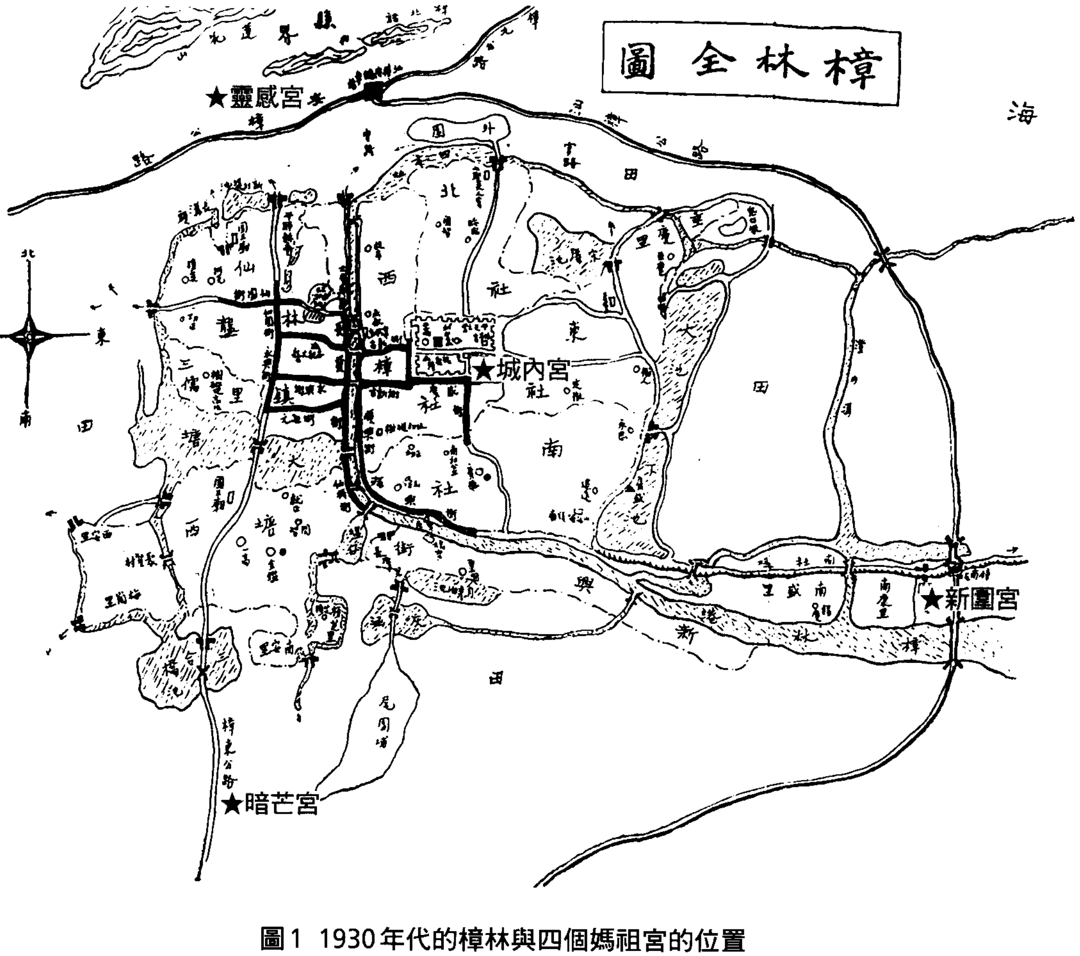

圖1 1930年代的樟林與四個媽祖宮的位置

資料來源：盧明、陳國樑 1936：插頁。★ 號處為四個媽祖宮的位置，是作者所標示。

二、靈感宮與關於開村前歷史的傳說

儘管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所修《潮州府志》已經記載饒平縣蘇灣都江北堡有「樟林村」(郭春震1547:卷8:6b),但當時樟林並非一個聚落。根據1981年8月在當地發現的從明代嘉靖至清代嘉慶年間一批地方檔案的記載,[3]從元代至明中葉,樟林村的居民一直散居在今樟林北面的蓮花山麓,由蔡厝圍、程厝圍、周厝圍、驛後、勝塘、後溝、小隴、大隴等小鄉里組成,歸東隴河泊所管轄。[4]東隴河泊所是當時潮州府的三個河泊所之一(申時行等1587:卷36:7a)。據「樟林鄉土史料」之〈鄉黨里甲解疑〉載:

> 至我濱址,則有微殊者。地臨海濱,田地希隘,資海為生者甚多。歷來賦役有三:一曰軍役,明洪武三年設禦海氛,有事捍海,無事耕種,此隸于指揮者也;二曰魚役,明洪武十四年初征漁舟輸米,以供軍貢,以防衛於我者,此隸於河泊者也;三曰排戶,明成化十四年新置饒平,按十家保聚,以地之出,供上之賦,使□(原件缺損一字)司于我者也,此隸于縣令者也。此者皆歷來供賦之謂也。

這段史料對理解作為一個聚落的樟林開村前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軍役和漁課始徵於洪武年間,是明代蛋戶和漁戶承擔的主要賦役。成化十四年以前樟林居民僅有這兩種賦役,說明其生計應以漁業為主要來源,組成「樟林村」的各個聚落單位都是小漁村。

---

3 這些文獻現以「樟林鄉土史料」為題,以專集形式收藏於澄海縣博物館。其主要內容包括:一、明代嘉靖三十五年至萬曆五年樟林建寨初期的一批當地里甲排年戶給官府的呈文;二、題為「古跡大觀」的關於明末以前地方歷史的文章,作者不詳;三、清代康熙十一年募捐重建東社三山國王廟的一批文獻;四、康熙元年至康熙八年有關當地「遷海」和「復界」的一批檔案,主要為官府的告示和牌文;五、落款為「康熙戊辰正月望日八十三歲上林氏撰」關於明清之際地方歷史的長篇記述,無標題,筆者在引用時擬題為「上林氏記述」;六、題為「鄉党里甲解疑」的長文,作者不詳;七、清代乾隆五十年至嘉慶二十二年題為「范阿宛乞參上房屋地案」的一批有關訴訟文書。

4 同註3「樟林鄉土史料」之〈鄉黨里甲解疑〉。

關於這段開村前歷史的細節，當地人已不甚瞭解。清代康熙和雍正兩個版本的《澄海縣誌》，在記載「樟林寨」時，都迴避記載城寨建立的時間（王岱1686：卷4：6a；甯時文1731：卷4：6a）。到嘉慶《澄海縣誌》，則把作為開村標誌的「樟林寨」建立的時間誤記為「創自明初」（李書吉1815，卷3：3b），在1981年上述地方檔案被發現之前，當地文人在筆記、鄉土志等記載中也都接受縣誌的這一說法，而不知建寨的確切年份是明代中後期的嘉靖三十五年。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先輩以漁為業，居住於蓮花山麓的若干小漁村這一點卻堅信不疑，並流傳著許多與開村有關的歷史傳說。他們用於支援這種信念和傳說的主要根據，就是至今尚存的位於蓮花山南麓石壁頭地方的祭祀媽祖的「靈感宮」遺址的存在。

「靈感宮」現在被當地人依諧音轉稱為「娘感宮」，是一座極不起眼的蕞爾小廟：

> 靈感宮在石壁頭山腳下，寬廣數尺，正中有浮雕石壁，天后肅穆居中而坐，二使女侍于兩側，宮門橫額鐫「靈感宮」三字。（黃光舜1996：91）

康熙年間自稱為「上林氏」的一位當地鄉紳指出，開村之前「靈感宮」就是蓮花山邊的若干小村落的「境主」：

> 嘗考山邊草洋內則有陸厝園，坑埔之南則有周厝園，此乃前人屋居，後搬為田。至萬曆、崇禎又遭水堆積為埔，本里各姓俱有田在焉。又石壁頭小墩下則為境主天后娘靈感宮，驛後、勝塘、後溝則為諸姓里居。此先人傳習，以為元初之煙址也。[5]

當地文人相信「靈感宮」建於元代，並以此作為樟林人早已在本地定居的歷史證據，是經過一番細緻的考據的：

5　同註3「樟林鄉土史料」之〈古跡大觀〉。

從宮名冠以靈感二字推斷，此神宇當建于元代中後期。元文宗天曆二年，加海神天妃封號共八字，其首兩字為「靈感」，加後之全封號為「靈感助順福德徽烈廣濟輔聖庇民顯佑護國明著天妃」。四十三年後之明太祖洪武五年改封為「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又三十七年後之成祖永樂七年再改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慈弘仁普濟天妃」。樟林先民名天妃宮不用漢人封號而用蒙古人封號，其原因只能是此神廟之蓋建，當在元文宗天曆二年之後，元王朝覆滅之前，至遲不下于洪武五年。（黃光舜1996：91-92）

實際上，歷代皇朝對天后的褒封，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版的《敕封天后志》記載，與天后信仰有關的敕封中，「靈感」二字最早是南宋甯宗慶元六年（1200年）出現的，是年媽祖之父被加封為「靈感嘉佑侯」。而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年）對媽祖的封號則為「護國輔聖庇民顯佑廣濟靈感助順福惠徽烈明著天妃」（林清標1778：11b-12b），與前引之考證不同。《敕封天后志》的記載主要根據明末清初成書的《天妃顯聖錄》，該書所記天曆二年的天妃的封號就是「護國輔聖庇民顯佑廣濟靈感助順福惠徽烈明著天妃」（林堯俞等1957：2）。有意思的是，成書更早的《元史》的記載與上引說法不同：「（天曆二年冬十月）己亥，加封天妃為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賜廟額曰靈慈，遣使致祭」（宋濂、王濂1986：7329），封號中沒有「靈感」二字。對天后信仰進行了開拓性研究的李獻璋教授，據此認為《天妃顯聖錄》「列舉的神號很多不正確，……誥文中的『誥封二十字』，恐怕是『一十字』的誤抄，我覺得記作『二十字』是恣意集中封號湊數」（李獻璋1995：110）。可見，講元代天妃的封號已有「靈感」二字，很可能是清代人臆想的結果。但是，這完全不影響樟林人把石壁頭媽祖宮的廟名，作為推斷先人活動遺跡的證據。

本世紀50年代初，靈感宮被毀，只剩下湮沒於草叢之中的刻有媽祖和兩位侍女像的一幅不大的浮雕。但這個廟宇曾經存在的事實，仍然被當地人不斷的強調，因為它已經被視為村落的歷史淵源主要標誌。原樟林中學校長、本地公認的對樟林地方史最有研究的學者李紹雄先生，于1990年出版很有影響的《樟林滄桑錄》一書，該書一再提到「靈感宮」的存在，強調：從宮的命名和建

築形式看來，靈感宮建于元初。作為樟林先民的『元初煙址』的標誌，應是可信的（李紹雄1990：18）。

三、「暗芒宮」傳說與開村初期的社會動亂

明代中後期，東南沿海社會激烈動盪。從嘉靖年間開始，潮州一直深受「山賊」、「海盜」與「倭寇」之苦，如嘉靖時工部左侍郎海陽人陳一松「代鄉耆民草」之《為懇天恩賜留保障憲臣以急救生民疏》所言：「潮州地方逖懸嶺外，山海盜賊匪茹，遭荼毒之慘者，垂十餘年。群醜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陳一松1847：7a）。當時地方社會「民」、「匪」難分，政府軍事力量嚴重不足，結果官府只好多次「通行各縣，諭令小民歸併大村，起集父子、丁夫互相防守，附郭人民俱移入城內。」（黃佐1561：卷66：83b）。由此促使潮州沿海的聚落形態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變化，現在潮州地方所見許多大的居民點，都是這個時期由一些散居的小村莊歸併而成的。以澄海縣為例：

> 在下外為冠隴寨，在上外為莿林寨；在中外為渡頭寨；在蘇灣為程洋岡寨，為南灣寨，為樟林寨；在蓬州為歧山上寨，為歧山下寨，為下埔寨，為鷗汀背寨，為外沙上、中、下寨；在鱷浦為水吼橋寨，為湖頭市寨，為厚隴寨，為月浦上、中、下寨，為長子橋寨；在鮀江為鮀浦寨，為蓮塘寨，為大場寨。以上諸寨百姓因寇盜充斥，置寨防禦，自為戰守。（王岱1668：卷11：2b）

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嘉靖三十五年，原散居於蓮花山麓的各村共15姓居民得到官府批准，於山下官埔合村築寨居住，是為作為一個聚落的樟林「開村」之始。築寨合村的主要理由，是為了防禦倭寇和海盜的騷擾，當時各村里甲排年戶丁藍城居等呈送潮州府的《建寨呈文》詳細記錄了這一過程：

> 居等海濱蟻民，命乖運蹇，居址蓮勝荒丘，三五成室，七八共居。可為生者，耕田捕海；遵治化者，變物完官。前屬海陽，今隸饒平，課

排軍民，凜分赫然。何今復為不幸，倭寇猖獗，東海汪洋，無可禦堵，西土孔邇，難以救援。況又河口軍衛、驛地步兵，各自保守，庶個窮黎，哀救無門，家室所有，悉為洗訖。慘慘哭哭，莫可乃何。今遺余蘇，商度計阻，必合聚築，稍能存生。故本年三月合集眾村移會南面官埔創住。但斯地樟林、櫕楠叢雜，可為屋具，四面溝湖深曼，可為備防。然又眾庶激奮，歡願捐資築防……。[6]

不過，城寨的建立並未意味著災難的結束。從嘉靖末年至清代康熙初年，潮州地區與整個東南沿海一樣，在長達百年的時間裏，經受了山賊、海盜為禍，南明與清兵拉鋸作戰，以及「遷海」等一系列動亂事件的衝擊，地方社會一直處於動盪和重新整合的過程之中。樟林在嘉靖至崇禎年間多次被海盜進襲，不斷經歷著建寨—破寨—再建寨—再破寨的過程。上林氏描述了這個時期地方社會混亂的情形：

我樟自嘉靖三十五年建防，四十一年破陷，迄今一百五十載。其中可悲可泣者甚多，可欣可喜者亦不少。如築寨以保聚，立五門，寬一佰丈零五尺，炮櫃六個，禦衛亦固矣，喜也。及寨破，屍骸遍野，猶可悲也。建廟祠，置居室，設約規以垂訓，喜也，可欣也。至於海寇不息，居處無定所，貧者死，富者亦亡矣，愈復可悲也。如此而欺肉而生白骨，其可得乎。[7]

有意思的是，有關這一時期本地天后崇拜的傳說，也與海盜的故事聯繫在一起：

樟東路天后宮，原名暗芒宮，年久後人誤為暗巷宮。昔日乃祀於紅肉埔村內。

6 同註3「樟林鄉土史料」之〈建寨呈文〉。
7 同註3「樟林鄉土史料」之〈上林氏記述〉。

> 當日王化未敷，沿海皆盜。紅肉埔亦是盜窟。獨一婦性甚貞潔，雖居盜窟而不為盜，率子業漁。
>
> 該村屢犯劫案，官府派員偵緝，有偽飾補篛者，見該村出補竹器，多遺芝麻器中，察其居民，原非業農，何多有此物。而近一船被劫，恰多載芝麻，則該村所劫無疑。官府遂（派）大軍，乘賊人除夕必盡回家度年，一網打盡之。
>
> 固此婦本屬善良，王兵來剿，玉石豈有辯乎？可是心地光明，吉祥自為之呵護，古人之言果非妄語。此婦先於前日白晝遇一老姥，謂之曰：「婦，汝不日若見龜爬出門限，大禍即至。宜即刻逃出里外以避之，且必負我同走。切記」。言訖，轉眼不見。知為神明下示，遂牢記心中。至除夕祭祀祖先，桌上有此殼龜不覺傾落地上，拾之，更有跳出門外者。一時觸動上日神明囑語，必是宮中聖母。時已入夜，遂率其子收拾細軟物件，同入宮中，背了聖母神像，逃出里門。官已來圍捕矣。母乃匿暗芒中，因得免禍。益感天后神恩，後遂建廟於此，故名暗芒宮。（陳汰餘[8]1945：25a-b）[9]

這個傳說的藍本是當地相當有名的「劫皇姑船案」故事：「野老相傳，明之中葉，有皇姑樓船從此經過，沿海諸盜糾而劫之，紅肉埔賊亦與焉」（陳汰餘1945：13a）。其時正是樟林開村前後的事情。「暗芒宮」實際建立的時間已不可考，有意思的是，這個流傳至今的有關媽祖顯靈的傳說，與我們對明代中後期當地社會環境的瞭解竟如此的一致（陳春聲1996，2001a，2002）。

對本研究而言，這個傳說中最有意思的內容有二，一是當時本地人「盜」、「民」難分；二是官兵平盜時玉石俱焚，百姓由散居小村遷入防守嚴密的城寨，與其說是防盜，更不如說是為了躲兵。而這些正是該時期潮州地方社會最重要

---

8 本文較多引用陳汰余《樟林鄉土志略》一書。陳汰余先生是民國時期當地知名鄉紳。《樟林鄉土志略》現存稿本，其序言落款為「陳汰余輯，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但書中記事有至1950年代者。全書包括鄉土之原始、名稱之由來、氣候、鄉民之來源、物產、鄉民生計、鄉土變遷、歷朝貴顯、篤行、裝服、藝術、災變、建設、廟宇、古跡、怪異、先賢文藝等17部分內容。

9 文中，「篛」是一種竹編的晾曬用品。「此殼龜」潮州地區過年時祭神的一種用俗名「此殼」的野菜和米粉等做成的食品。「暗芒」是一種茅草。這三個辭彙都是用潮州話諧音字記錄下來的。

的特點之一。關於當時地方上「民」、「盜」不分的情形，地方文獻記載甚多，例如，嘉靖年間著名鄉紳林大春在《論海寇必誅狀》一文中就講到當地人與海寇互通聲氣的情形：

海寇固未易絕也。彼其延蔓既久，枝幹日繁。一邑九鄉，半為賊藪。是沿海之鄉，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黨羽既眾，分布日廣。自州郡以至監司，一有舉動，必先知之。是州郡監司之左右胥役，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舟楫往來，皆經給票，商旅貨物，盡為抽分，是沿海之舟楫商旅，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奪人之糧，剽吏之金，輒賑給貧民，貧民莫不樂而爭赴之，是沿海貧民，無一而非海寇之人也。（林大春1935：4b-5a）

至於官軍侵害民間和百姓為逃避官軍滋擾而搬入大村居住的情況，在當時的地方記載中也舉不勝舉。如建立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海陽縣《塘湖劉公禦倭保障碑記》就記載了類似的情形：

海陽隆津之市鎮曰塘湖，北負郡城，東枕大河，西接原野，南環滄海。田疇百里，煙廬萬井，實衍沃奥區。承平以來百九十載，民弗知兵，惟弦誦貿易以趨事樂生。靡有崇墉巨障、堅甲利刃為防禦之具。蓋頤世柔良，其積習也久矣。歲在嘉靖丁已之秋，盜起鄰境，聚黨侵陷揭陽。凡密邇本鎮村落，咸被荼毒。

適鄉大夫少參劉見湖先生終制家食，目擊時事若恫□（原件缺損一字）。乃身謀諸鄉者，建堡立甲，置柵設堠，鼓以義勇，申嚴約束相率捍禦，民賴以寧居。

無何，值戊午首春，倭寇突至，屯壘揭陽之鮀江，恣行劫掠，莫之敢膺。凡大井、鮀浦、蓬州、庵頭等處，悉被殘破。戕其老稚，擄其丁壯，焚其室廬，禍亂之慘，近古所無。塘湖之民，日夜憂惶，咸思欲舉家移竄，以避其鋒。

先生慮桑梓之將及禍，義不容諉。乃與鄉人約，視產高下，斂九則之金，以為防守之費。初有一二為梗者，先生諭以大義，咸樂信從。相

要害之處，重設柵閘，度可乘之隙，高築戰柵。率其丁壯，各分信地，更番防守。至於往來兵夫犒勞之需予，預為處分，動中機宜。以故倭寇之肆掠於鄰近村落者，警報日至，獨於是鎮迄不敢犯。向非先生倡義防守，則是鎮為潮南之通衢，民物殷盛，寇所垂涎，安能偃然若是耶？

凡調發兵夫，經過是鎮者，不下萬人。在它鄉鎮，往往肆行劫奪，民怨是叢。或惶為接濟，靡所控訴。惟是鎮賴先生之庇，頗為斂戢。初有長樂兵經塘湖與屠戶曾七競，兵以刀斫傷其額而奪其肉，先生為白之，別駕虞候竟逮其人，嚴械警眾。鄉人方邦宰家近道旁，被程鄉兵破門肆掠，先生率鄉夫捍禦，乃徒步往，諭以國法禍福，兵遂遁去。有肖達茂者，商販自郡城而歸，遇東莞兵，奪其所致之金，馳訴先生，令堡甲長縛送之官，為籲於當道，還其金而罪其人。復有農家蔡世重。林七者被兵夫誣執為接濟，先生憐其枉，躬馳辯白，為釋其縛。其鋤強遏惡，扶持善良，類如此。是以鄰鄉之民聞先生之風，以塘湖為晏土，扶老攜幼以就籍，其餘庇者且數十百家。（陳曆明 1985：335）

「紅肉埔」位於樟林村南面，早已無人居住，現在農民在此地耕作時，有時還可挖到一些爛磚破瓦，樟林人講就是所謂「紅肉埔村」的遺存。在以上的傳說中，媽祖為了逃避兵禍而遷居樟林，這也正是明代中後期樟林人自己的經歷。

四、樟林港興起與新圍天后宮的建立

如前所述，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海禁」之後，樟林由於其位於「河海交匯」之區，有最便捷水路通往府城和韓江上游的有利地理位置，逐漸成為當時最著名的近海帆船貿易口岸之一，乾隆、嘉慶年間樟林港貿易達到其全盛時期。在此期間，各地客商、船戶和其他外來人口大量到樟林定居，社區的範圍不斷擴大。嘉慶年間擔任澄海知縣的尹佩紳這樣描述樟林的貿易地位：

> 樟林，澄之鉅鎮也。……澄濱大海，民多業於海。樟林尤河海交匯之墟，閩商浙客，巨艦高桅，揚帆掛席，出入往來之處也。(尹佩紳1827b)

其時，從樟林港出發的商船北上上海、天津，南下廣州、瓊州，以至日本、琉球和東南亞各國，在韓江幹流和三角洲縱橫交錯的水網中行駛的各種內河船隻更使樟林成為一個繁盛的轉口貿易據點。當時在樟林港從事貿易活動的是著名的「紅頭船」(當地人也叫「洋船」)。1971年和1972年，在樟林附近的河灘出土了兩艘清代紅頭船，其中一艘還刻有「廣東省潮州府領口雙桅壹佰肆拾伍號蔡萬利商船」字樣(蔡英豪，1987:52-53)。光緒年間寫成的民間唱本《樟林遊火帝歌》中，有一些關於樟林港貿易繁盛時期洋船商人和「紅頭船」的內容：

> 此是閒文唱不完，唱出人物恁知端：男女約有五十萬，金頂色頂數十員。舉貢生員甚是多，尚書達士亦莫無，積祖富貴也不少，發有洋船數十號。姓陳發只恩隆城，一號癢發更才能，姓楊一號叫和裕，姓洪萬昌愈更興。姓許有只美芝公，發有三號更威風，一號叫做萬和發，二號叫做萬合隆，三號叫做萬合成。瓜冊合爺更才情，一號洋行叫福順，一號玉順走太升。

隨著「洋船」貿易的發展，商人、船主以及其他與商業活動有關的各色人等雲集樟林(這些從外地來移居樟林的洋船商人被稱為「外埠主」)，並在港口周圍建立了大批貨棧(即「洋船棧」)。早期的「洋船棧」主要集中於「八街」之一的仙橋街。「洋船棧」中最著名的是蔡厝內的「藏資樓」。樓主蔡彥本為澄海縣程洋崗鄉人，其父輩已經營洋船業，發跡後全家移居樟林，其商號名為「蔡萬盛」。他于乾隆年間建「藏資樓」。該樓占地面積約300平方米，主要為棧房，少數房間做住房，並附屬有書齋「梅園」(蔡英豪1987:51-52；李紹雄1990:52，54)。

乾隆末年至嘉慶初年，洋船商人林咸惠（林五）等在樟林港口南岸，與樟林鄉隔河相望的地方，建立一個新的名為「新興街」的貨棧區。據林氏《達祖祠譜牒》記載和林氏後人追憶，林氏是從澄海縣南沙鄉遷來樟林居住的，林咸惠曾為其父林萬達「捐封贈」為「朝議大夫」（李書吉1815：卷17：53a），並于嘉慶七年（1802年）在新興街南面建設規制宏大的三座私宅兼林萬達祠堂「朝議第」（即當地人所稱之「內祠」）。據稱，林咸惠與很受乾隆、嘉慶二位皇帝賞識的當朝大臣蔡新之子亦為拜盟兄弟。「新興街」全長180多米，整個街區由54間貨棧組成，每間貨棧均為兩層建築，寬5米，長16–21米不等，臨港的貨棧都有獨立的小碼頭，便於貨物裝卸（蔡英豪1987：48–50；李紹雄1990：39–40）。林家的商號為「振發行」，最盛時擁有「萬昌」、「萬盛」、「萬隆」三艘紅頭船（黃光武1996）。新興街的出現標誌著港口發展的新階段，也反映了洋船商人勢力的擴大。

就在樟林港貿易最繁盛的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間（1787--1792年），在接近港口入海的新圍地方，修築了當時廣東省最大的天后宮。這座天后宮的建築據說是以福建泉州的天后宮為藍本的，其形制和規模至今仍被當地文人引以為榮：

> 全座結構緊密，建築形式為中軸線宮殿式建築。計有正殿、前棟、梳妝樓（望海樓）、拜亭、東西兩廡及周圍埕道、後座、戲臺等，占地數畝。……大門前有池塘，塘邊巨型灰獅一對，高二米餘。門前石獅、石鼓各一對。大門後面，有清代著名書法家劉墉寫的「海國安瀾」巨匾。（李紹雄1990：41）

而林氏後人追憶說，後來創建「新興街」的林咸惠也參與了新圍天后宮的修建。[10]在新圍天后宮東西兩廡有乾隆五十六年所立的22塊建廟捐款碑，因為碑記部分字跡已浸漫不清，這一說法難以驗證。從碑記的內容可以看出，捐款者包括了粵東、閩南沿海數縣的官員和士紳，也包括了來自韓江上游的嘉應州

---

10 請見黃光武（1996），《嘉慶十年澄海二林通匪案——兼談樟林新興街、新圍天后廟的有關歷史問題》所附林聖渠、林聖旭、林修偉所撰〈咸惠公與新興街〉一文。

和大埔縣的信眾，而最主要的捐獻者則是數十家「商船戶」和近百對艚船的舵公。每年天后誕時，前來拜祭的包括了閩粵交界地方數縣的信眾。

新圍天后宮捐款的信眾中，有一位名叫「陳萬金」的。[11]在琉球王國的檔案中，有一份記錄了乾隆五十年（1787年）一條從澄海縣出海貿易，後因遇風漂泊到琉球的商船的情況，有意思的是，該商船的船戶也叫「陳萬金」。該船戶于乾隆五十一年三月駕船返國前，在琉球王國領取了如下「執照」：

> 琉球國中山府知府毛，為知會事。據本國山北地方官報稱，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有海船一隻，漂至運天地方。詢據船戶陳萬金口稱：「萬金等系廣東潮州府澄海縣商人，共計三十八名，駕澄字五百二十三號船隻，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裝載檳榔，本縣開船，七月十五日到天津府兌換貿易。十月初七日其處出口，十一月初六日往到盛京省奉天府寧海縣置買黃豆。十一月二十八日開船，十二月初二日到山東大石島山，同日放洋，要回本縣。不擬初三日徒遭西風大作，波浪猛起，砍棄桅蓬，丟掉豆貨，任風漂流。十二日夜漂到貴國葉壁山地方，十四日彼山民搭坐本船，引到貴轄地方」等語。即給米糧柴水等件等情前來。隨委員役引導萬金船隻，經于本年正月初五日轉駕來中山泊村地方。業經照例發館安頓，給與廩餼，撫恤養贍。又將原船修葺堅固，並給大桅、風篷、繩索等件。宜俟順風遣發回國。為此，合就給照為據。須至執照者，計開……。（蔡鐸等1972：3666）

該執照的後半部分開列了船戶陳萬金、舵工蔡仲和31位水手、5位客商的姓名，以及19件「隨帶物件」。上引執照中提到的「中山泊村」，又稱「泊港」，是傳統時期琉球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其時琉球王國為中國的朝貢國，兩國在照顧和遣返遇難船員方面有很密切的合作。陳萬金的「隨帶物件」中包括「一天后娘娘一位，一千里眼將一位，一順風耳將一位，一女婢二位」等，反映當

11　西廡第八碑，原碑仍存於新圍天后宮舊址。承蒙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黃挺教授提供根據拓片整理的新圍天后宮碑文抄本，並糾正作者原手抄件之多處錯誤，謹致謝忱。

時商船戶普遍的信仰。在《歷代寶案》中，還有其他多位從澄海出海的海商因遇險而到達琉球的記載（陳春聲2001b）。

本世紀30年代，清華大學陳達教授得到「太平洋國際學會」資助，在進行「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課題的研究時，曾到樟林做過實地調查，所收集的有關天后的「靈驗」故事，都與航海安全有關。試舉一例如下：

> 汕頭某村（即樟林——引者注）有一位紳士，其曾祖嘗和暹邏通商。有一次其「紅頭船」遭遇極大的危險，一日某紳以其曾祖的「像贊」示著者，內有一段說：「曾祖考諱僕字仁灼，前朝敕授儒林郎，六品封典。祖即高祖峰之五公子也。自少習庭訓，長興航業。中途遭颶風，飄流琉球百島，船及貨物均為島民吞沒。祖隻身揹神像渡海，得達山東，行乞以歸，已一年矣。當時家人聞船漂落無蹤，意謂沉沒，即居喪如禮，慶歸服除。祖至是一身之外，別無長物，再向親友借貸造船，航往南北兩洋。惜所運僅木材樹皮諸賤物，不能獲利，晏如也。會星洲煙土跌價，勉辦多少，回國運往上海。船次崖門，門吏以此船向運賤貨，免查揮去，抵上海煙土獲利甚豐。驚識廣東燒煙起釁，崖門不查，化禍為福，迨天賜歟？遂捐資修黃河決口，使臣嘉許，達部冊封」。（陳達1938：45–46）[12]

新圍天后宮因為其建築規模巨大，建築精美，一直被視為樟林古港最重要標誌物。樟林的多座媽祖廟中，只有新圍天后宮被載入《澄海縣誌》（李書吉1815：卷16：16a）。本世紀40至60年代，李獻璋先生在從事《媽祖信仰研究》一書的寫作時，也注意到新圍天后宮的存在（1995：154）。當代學者在論述廣東的天后信仰時，仍然會提到新圍天后宮規模居全省之冠：

12　《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陳達 1938：278），再次講到這個故事，並說明遇險時所揹神像即「天后聖母」。

> 乾隆年間樟林興建的一座新天后宮(當地人稱媽祖新宮)占地近十畝，歷時六年，宏規巨制、堂皇壯麗為粵東之冠，這與當時樟林在粵東的經濟地位適相匹配。(陳忠烈 1994)

不過，在田野調查中作者的一個深刻印象是，由於新圍天后宮的創立者有許多是外來的官員、商人、船主和水手，其祭祀範圍也遠遠不只限於樟林一鄉，這個後來被外來的訪問者高度重視的廟宇，與社區內部的社會生活似乎聯繫比較疏遠。在樟林還是一個貿易口岸的時候，許多外來的客商、船戶、舵公等在此居住，他們的信仰和財力足以支持一個大規模廟宇的運作，天后宮與社區內部的關係親疏並不直接對廟宇的命運產生影響。但是，一旦港口衰落和社區性質發生變化，情況就不同了。

咸豐以後海上貿易的性質發生了重大改變，汕頭開埠和機器輪船的使用，導致了樟林港傳統貿易方式的衰落，《樟林鄉土志略》記其事曰：

> 咸豐之世，紅頭船(即洋船)改變為甲板船，不多時又由甲板而變為火輪船。樟林口岸無形中移出沙汕頭。(陳汰餘1945：5b)

港口衰落以後，樟林作為一個僑鄉繼續發展，從海外流入的大量僑匯使其財富積聚過程延續了下來，華僑回到故里建設「新鄉」積極活動，使整個社區面積在清末民初擴大了差不多一倍。

但是，由於廟宇的主要支持者的離開，新圍天后宮日漸破敗。經過1918年的八級大地震和1922「八二風災」，天后宮的大門和正殿倒塌，僅餘兩廡和殿后的「梳妝樓」。1949年以後，其地成為民居。近年在此居住，自稱來自莆田的林姓人家，重新為天后設立小神龕拜祭，但香火極為稀落。而且，根據調查時得到的印象，這些自稱媽祖後人的林姓人家在此居住，其目的與其說是要延續媽祖的香火，還不如說是為了等待這個已經被列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且時有重建呼聲的廟宇修復時，得到一筆搬遷的補償費。

有意思的是，近20年樟林的許多民間廟宇得以重建和恢復活動，連建路邊的極不起眼的猴爺、臼媽之類等蕞爾小廟都有人出面重建，但被「外人」視為樟林港標誌物的新圍天后宮，始終未能重建。與本地人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圍天后宮在潮汕移居海外的華僑中仍有很大影響，泰國、香港等地

潮州同鄉會組織出版的多種刊物，都以較大篇幅介紹新圍天后宮，每年有不少華僑到其遺址參觀，並捐款籌建以天后宮為中心的樟林古港公園。地方上的文人和文博單位，也對其表現出很大熱情，除將該廟列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外，還多次要求政府出面組織修復工作。

不過，迄今為止，恢復新圍天后宮的工作並無實際進展。

五、城內天后宮與有關「亥爺」的傳說

前述三座媽祖廟實際上都位於社區以外，真正位於樟林社區內部的天后宮是乾隆五十九年在樟林城寨內修建的「城內天后宮」。如前所述，「城內天后宮」建在城寨中央兩條主要街巷的交匯處，但傳說中廟宇的建立不具有官方色彩，甚至也不是由鄉眾或其他信眾合力建築的，而完全是本地一個姓林的商船船主個人出資修建的。

「城內天后宮」規模不大，只是一間面積約20平方米屋子，神臺的擺設與我們在潮州地區所見的一般媽祖廟並無二致，中間是媽祖，兩側為花公花媽和福德老爺，神臺前面的供桌上站著千里眼和順風耳。廟宇內部布局最不平常之處，就是在媽祖像右前方的廟門一側，有一頭面對媽祖、虎視眈眈的大豬塑像，當地人稱之為「亥爺」。目前城內天后宮在樟林各座媽祖廟中是香火最為鼎盛的，作者在調查中發現，當地人對該廟的宗教熱情，不僅僅出自對媽祖的崇拜，更重要的是由於在當地流傳的一個眾所周知的關於「亥爺」的傳說。

> 城南門內天后廟，乾隆壬子年北社和春號紅頭船船主林某所建。相傳某幼年失怙，家境貧寒，母思再醮，方處村外，有大豬擋路，汙了衣裳，乃委諸天意，絕再嫁之念而矢志撫孤。後某行洋船起家，蓋建此神宇，因感念前事，特塑泥豬一頭，拜祀廟內，與血食焉。樟林諺曰：『亥爺得飯媽祖福』，即指此。（黃光舜1996：111）

聽了這個在本社區幾乎家喻戶曉的故事後進入天后宮，總是免不了產生「亥爺」蹲在門口是為了防止媽祖出門的聯想。「亥爺」的存在及其相關的傳說，

破壞了天后宮應有的大度、端莊、和諧的氣氛，使人想到社區內部唯一的這座天后宮，表達的與其說是對媽祖的信仰，還不如說是這個成年男子常出遠門的僑鄉和港埠對在家婦女貞操的關注。在這個特定的氛圍中，媽祖作為女性的象徵，實際上受到的是歧視，甚至是褻瀆。有意思的是，正是這個故事使城內天后宮受到更多的關注，從而一直香火旺盛。

實際上，城內天后宮是目前樟林社區中唯一「活著」的，仍有較多信眾，每年三月初三「天后誕」時有眾多的婦女前來拜祭的媽祖廟。城內天后宮至今仍保持生命力的理由可多方面理解，包括廟宇位於社區中央，來往方便，容易進入平常百姓日常生活的「視野」；傳說中這個廟宇的建設者是樟林本地人，他的生活經歷代表了樟林人心目中的成功者的「理想模型」；傳說的內容雖然不算文雅，但卻充分表達了普通女人生活的艱辛，較易引起一般人同情的聯想等等。還有一點是不可忽視的，就是在現代的口頭傳說中，林姓船主的身分變成到南洋「過番」的華僑，他發財後回家探母，聽母親講了前面的故事，就建了這座天后宮（陳春聲、陳文惠，1994）。這與清末以後樟林人大量出洋，樟林成為著名僑鄉，百姓日常生活和社區公共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僑匯的歷史變遷，是相吻合的。而且，傳說內容的適當「修正」，也吸引了不少從海外回來探親的華僑前來拜祭。

六、結　語

在以往的研究中，作者曾試圖通過對樟林的考察，表達有關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陳春聲2003：1-33）。作者指出，在是否更接近「事實真相」的意義上爭論「口述資料」和本地人記述的學術價值，是沒有價值的。研究者的責任不在於指出傳說中的「事實」的對錯，而是要通過對百姓的歷史記憶的解讀，瞭解這些記憶所反映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是如何在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積澱和形成的。正是這個意義上，「口述資料」和本地人的記述，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鄉村歷史的「事實」和內在脈絡。作者也曾利用樟林的個案，說明當研究者在與「國家制度」相對應的意義上，使用「鄉村社會」這一概念的時候，有必要考慮在什麼樣的前提下或程度上，「鄉村社會」可以作為一個具

有「均質性」的分析概念被使用的問題。如果在運用這類概念時能多一點自覺，我們對鄉村社會生活的理解要豐富和深刻得多。作者還試圖說明，儘管在樟林這一類在地域社會中有重要地位的鄉村中，存在著地方官員直接干預鄉村事務的大量例證，但更重要的是，鄉民觀念中關於來自國家的「正統性」的理解，是如何在鄉村的組織結構和日常事務中有意無意地表達出來的。在有關地域社會的研究中，作者一再強調要用「整體歷史」的觀念去理解地域社會的歷史脈絡，將鄉村置於地域社會的脈絡之中，對更深刻的理解鄉村的故事與國家歷史的關係，具有方法論上重要的意義。

作者也反複指出，在實地調查中，研究者必須保持一種自覺，即他們在「口述資料」中發現的歷史不會比官修的史書更接近「事實真相」，百姓的「歷史記憶」表達的常常是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歷史背景的解釋，而不是歷史事實本身，但在那樣的場景之中，常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過去如何被現在創造出來，理解同樣也是作為「歷史記憶」資料的史書，其真正的意義所在及其各種可能的「轉換」（陳春聲2006：9-18）。本文試圖通過對樟林四個媽祖廟的歷史變遷及其相關傳說的分析，說明神明的故事如何在不同場景下表達了不同的意義。

有意思的是，據說在社區發展不同階段建立的這四個媽祖廟，其相關的傳說正好反映了不同階段歷史的特點。以往有關村廟的靈驗傳說的研究，往往側重於考察這些傳說所蘊涵的文化象徵意義，以及傳說所反映的村落內部和村落之間的權力支配關係，我們的研究也許可以說明，在一個有較長時期的文獻性歷史記錄的社會裏，對靈驗傳說的解讀，還有助於對社區發展歷史的理解。

我們知道，在村廟的實際運作中，靈驗故事的創造與流播，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過程。與廟宇活動有關的信眾和周圍的人們，每天都在重複他們知道的傳說，同時他們也參與了故事的「創作」與「再創作」，通過這樣的過程表達、宣洩自己的體驗、情感和生活目的。樟林的故事似乎告訴我們，歷史這只「無形之手」實際上可能對林林總總的各種各樣傳說進行了某種「選擇」，使傳說中與文獻記載的歷史過程相契合的內容，在漫長的流播過程中，得以保留下來。在其背後起作用的，實際上是人們對社區歷史的「集體記憶」。

從樟林的故事還可以看出，這種「集體記憶」，在不同的人群之中有很大的不同。在調查中我們就發現，有關「靈感宮」、「暗芒宮」的傳說，只有退休教師等對地方文史有興趣的本地文人才系統瞭解，一般百姓大多更有興趣的是

「亥爺」的故事；對於海外華僑和社區外面的研究者來說，樟林的標誌就是「新園天后宮」，可是樟林當地人，不管是文人還是一般百姓，似乎對「新圍天后宮」的活動比較缺乏興趣，有關這個廟宇的靈驗故事，是因為陳達教授的紀錄才為我們所知。這種現象所反映的，實際上是不同人群對社區歷史的不同感受和理解。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認為，對廟宇的傳說的解讀，實際上是對不同的人有關社區歷史的「集體意識」的瞭解，這是一種「理解之理解」。

參考書目

尹佩紳

1827a　樟林鎮鼎建風伯神廟碑記。刊於鳳山記序（木刻本），頁21a–22b。

1827b　撥充風伯廟祭祀香燈章程碑記。刊於鳳山記序（木刻本），頁23a–25b。

王　岱

1686　康熙澄海縣誌。（木刻本）

田汝康

1957　17–19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申時行等

1587　明會典。（木刻本）

汕頭市史志委員會

1960　汕頭百年大事記，1858–1959。汕頭：汕頭市史志委員會。

宋　濂、王　濂等

1986　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李書吉

1815　嘉慶澄海縣誌。（木刻本）

李紹雄

1990　樟林滄桑錄。澄海：政協澄海縣委員會東裏鎮聯絡組、澄海縣文學藝術工作者聯絡會。（鉛印本）

李獻璋

1995　媽祖信仰研究，鄭彭年譯。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

林大春

1935　井丹林先生文集，第八卷。潮陽：郭氏雙百鹿齋。

林清標

1778　敕封天后志，卷上。（木刻本）

林堯俞等

1957 天妃顯聖錄，卷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林遠輝

2002 潮州古港樟林——資料與研究。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林遠輝、張應龍

1992 潮州樟林港史略（上）。海交史研究22：80–89。

1993 潮州樟林港史略（續）。海交史研究23：92–110。

素攀・占塔匿等

1991 泰國潮州人及其故鄉潮汕地區研究報告，第一期 樟林港（1767-1850）。曼谷：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亞洲研究所。

張映秋

1990 樟林港埠與紅頭船。汕頭文史8：26–41。

黃光武

1996 嘉慶十年澄海二林通匪案——兼談樟林新興街、新圍天后廟的有關歷史問題。潮學研究5：112–141。

黃光舜

1996 閑堂雜記。（鉛印本）

黃 佐

1561 嘉靖廣東通志。（木刻本）

甯時文

1731 雍正澄海縣誌。（木刻本）

郭之奇

1847 宛在堂集。刊於潮州耆舊集，卷三十三，馮奉初編。（木刻本）

郭春震

1547 嘉靖潮州府志。（木刻本）

盧 明、陳國樑

1936 樟林社會概況調查。廣州：中山大學社會研究所。

陳一松

1847 玉簡山堂集。刊於潮州耆舊集，卷十九，馮奉初編。（木刻本）

陳汰餘

1945 樟林鄉土志略。（稿本）

陳忠烈

1994 明清以來廣東民間「天后」女神崇拜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廣東社會科學5：113–119。

陳春聲

1993 從「遊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會——兼論潮州歌冊的社會史資料價值。潮學研究1：79-111。

1996 嘉靖「倭亂」與潮州地方文獻編修之關係——以「東裏志」的研究為中心。潮學研究5:65–85。

1997 「八二風災」所見之民國初年潮汕僑鄉——以樟林為例。潮學研究6:369–395。

2001a 從「倭亂」到「遷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動亂與鄉村社會變遷。明清論叢2:73-106。

2001b《歷代寶案》所見之清代潮州商人的海上貿易活動。潮學研究9:100-108。

2002 明末東南沿海社會重建與鄉紳之角色——以林大春與潮州雙忠公信仰的關係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4:35-43。

2003 鄉村的故事與國家的歷史——以樟林為例兼論傳統鄉村社會研究的方法問題。中國鄉村研究2:1-33。

2006 走向歷史現場。讀書9:19-28。

陳春聲、陳文惠

1994 社神崇拜與社區地域關係——樟林三山國王的研究。中山大學史學集刊2:90–105。

陳　達

1938 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

1981 浪跡十年。臺北:文海出版社。

陳曆明

1985 潮汕文物志,上冊。汕頭:汕頭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蔡英豪

1987 澄海縣文物志。澄海:澄海縣博物館。

蔡　鐸等

1972 歷代寶案。臺北:臺灣大學影印本。

陳春聲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廣東省廣州市新港西路135號
hssccs@mail.sysu.edu.cn

The Story of Mazu and the History of a Local Community:

Research on a Port in Eastern Guangdong in the Ming and Qing Eras

Chen Chunsheng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religion and changes in local history by examining the examples of four Mazu temples in Zhanglin village, a port for the coastal junk trade in eastern Guangdong. In so doing, it explores the changing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Tianhou (the queen of heaven) cult, which has been popular in south China,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within a single community. It shows that the legends related to the four temples, which were, according to the local people, built in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community's history,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society in different times. This study shows that decoding the legends of the Mazu goddess's efficacy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local community in a county that has a long documented history. It also tries to explain that the "invisible hand" of history may have "selected" the contents of legends that matched what had really happened, preserving them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The force behind such a process, in effect, is people's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heir community. We can see from the story of Zhanglin that "collective memory" is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Effectively, it represents different people's feelings and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ir communities. Therefore, our understanding of temple legends is actually an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bout their community.

Keywords: Mazu, Chaozhou, sea trade, folk religion, village society